

轉變中的大學

傳統、議題與前景

郭為藩 著



Universities in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

hi-EDU

等教育系列

轉變中的大學

傳統、議題與前景

Universities in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

郭為藩 著

高等教育出版

轉變中的大學：傳統、議題與前景 = Universities in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 / 郭為藩著. -- 初版. --

臺北市：高等教育, 2004【民 93】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814-572-1 (平裝)

1. 高等教育

525

93015659

轉變中的大學：傳統、議題與前景

Universities in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

作 者 郭為藩

出 版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 100 館前路 12 號 10 樓

電 話 (02)2388-5899

傳 真 (02)2388-6600

郵 撥 18814763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 記 證 局版北市業字第 390 號

總 經 銷 知識達圖書發行有限公司

傳 真 (02)2312-2288

出版日期 2004 年 10 月初版

定 價 300 元

ISBN 957-814-572-1

網址：www.edubook.com.tw

本書之文字、圖形、設計均係著作權所有，若有抄襲、模仿、冒用情事，依法追究。
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序 Preface

雖然在大學任教有二十多年，對大學的歷史發展卻只有一個粗略的印象。去年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借讀劍橋大學近年出版的兩套鉅著：一為H. De Ridder-Symoens主編的《歐洲大學發展史》；另一為Damien Riehl等四位學者分別主編的《劍橋大學發展史》，很有興趣地注意到歐洲傳統大學有不少傳統至今依然沿襲存在。雖然中世紀的大學與今日高等學府相比，規模上相差懸殊，但是在制度面卻是一脈相承的；十九世紀前，大學規模普遍很小，即使到1789年美國地區整個九所高等學府，學生總數也未逾千名。無論如何，大學與科舉是世界文化史上兩種最值得重視且歷史悠久而存續迄今的制度，其影響於知識份子及學術興衰也無與倫比，歷史學家自有深刻的分析。

最近一年間密集閱覽國外學者討論高等教育革新的文獻，特別是全球化對大學教育的衝擊，猛然察覺到歐美大學正進行一種「靜默的革命」，是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鉅幅的轉變；這場全球化知識產業競爭帶動的風潮，波濤洶湧，已波及東亞國家，日本、南韓及中國大陸都在政策上採取積極因應策略，台灣自難例外。身為學術界的一份子，不能不將所知所覺，將當前大學面對的困境及今後演變的可能出路，儘早讓有心改革教育及關心大學前途的學界人士參考。時間就是金錢，對主持大學校務發展與身負全國教育決策重任的人士而言，愈早掌握世界大勢之所趨，愈能減少決策上誤差的代價。筆者既已退休，能聊盡棉薄的「剩餘價值」，為忙於公務而無暇閱讀國外文獻的行政階層蒐集參考資料，益己利人，善莫大焉，這正是撰述本書的動機。

美國高等教育在第二次大戰後曾經有過三十年的黃金時期，1945年有高等教育機構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學生一百六十七萬

人；到了1975年，高等教育機構增至二千七百四十七所，學生總數高達一千一百二十萬人。國內近年來高等教育的擴充也迅速驚人。筆者離開教育部行政職務時，大學院校只有六十所，而七年後（九十二學年度）卻增加到一百五十二所，大學生人數也大約增加三倍，達九十八萬人。高等教育大眾化固然是可喜現象，問題是教育資源正在減少，連學生來源亦逐年因少子化而大幅降低，國內大學面對外來競爭愈來愈猛烈，而這些年來大學生單位教育費用卻反而下降。今後台灣的高等教育要力爭上游，提升國際競爭力，有待考慮的興革策略很多，大學的經營規模就是其中之一，筆者參與推動師範院校的聯合大學系統正基於此一動機。

本書討論的幾個主題，包括多校區大學系統、聯合學位、公立大學法人化、大學評鑑與品質保證、大學校長的遴選方式、研究型大學與排行榜、網路教學與推廣教育以及非傳統學生與終身學習……等都跟大學未來的調適及高等教育政策導向有關。本書也未忽略大學的人文主義傳統，所以用相當篇幅討論通識教育、學術自由、大學教師的學術責任、大學校長的任務、董事會的職能，並探討網際網路普及後大學校園的深度變化。本書試圖勾勒大學數百年來承襲的傳統形式，當前見仁見智的論題與多姿多采的風貌，以及今後十多年可能出現的前景，因而取「傳統、議題與前景」為副書名。雖然內容有限，但是大學的轉變脈絡約略浮現，而書後所列西文參考書目相當充足，有胃口進一步探索的讀者仍可按圖索驥，就關注的題材細嚼。

本書除了第四章及第九章曾分別摘引筆者發表過的〈大學教師的學術自由與社會責任〉及〈網路大學體制化的商榷〉兩篇文章的部分材料外，均係新作。完稿之時，適逢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揭曉而入學登記即將開始的七月天，各校招生新招千奇百態，讓人目眩，不由自主地喊出：「時代變了，大學也變了」；只是心裡總覺得很多值得珍惜的大學傳統實不該變，否則大學的本質也

將一齊流失，成為知識經濟的產業機構而已。想到這裡，衷心期盼人文思想的智慧繼續照耀中文世界的大學校園。

鄭君儒 誌

2004年9月於台北

目錄 contents

第一章 大學的歷史發展——從傳統到現代

- 第一節 大學制度的誕生 3
- 第二節 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期的大學發展 10
- 第三節 納入公共教育體系的大學 18

第二章 高等教育機構的類型

- 第一節 研究型大學的發展 33
- 第二節 綜合大學 38
- 第三節 技術學院 41
- 第四節 開放性的高等教育 44

第三章 美國聯合大學系統之探討

- 第一節 多校區大學系統的性質 51
- 第二節 美國大學系統的類型 53
- 第三節 大學系統的組織架構與功能 57
- 第四節 美國大學系統的觀察 61

第四章 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

- 第一節 學術自由理念的孕育 67
- 第二節 學術自由的性質與範圍 72
- 第三節 大學教師的社會責任 76

第四節	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關係	78
-----	--------------	----

第五章 大學校長的任務與其遴選

第一節	大學校長的角色	87
第二節	大學校長典型夙昔	92
第三節	大學校長的遴選	96

第六章 大學法人董事會的職能

第一節	美英傳統大學的董事會	106
第二節	董事會的成員組成與職權	109
第三節	大學董事會的制衡機制	114
第四節	董事會運作的基本模式	117

第七章 大學評鑑、認可與品質保證

第一節	大學教育品質管制的方式	124
第二節	大學評鑑的主要指標	129
第三節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運動	132

第八章 大學通識教育與核心課程

第一節	大學通識教育的推展	141
第二節	人文器識與人文素養	147
第三節	通識教育課程的設計	151

第九章 電子時代的大學推廣教育

- 第一節 大學校園裡的非傳統學生 159
- 第二節 大學網路教學的發展 165
- 第三節 遠距教學與大學經營市場化 169

第十章 高等教育的政策導向

- 第一節 面對全球化的大學發展策略 177
- 第二節 高等教育的資源開發與經營企業化 184
- 第三節 蛻變中的校園文化及其出路 192

參考書目 201

索引 219

第1章

大學的歷史發展 ——從傳統到現代

第一節 大學制度的誕生

一、大學出現的時代背景

歐洲地區自從西羅馬帝國崩析後，進入到所謂黑暗時代。一方面是王侯封建勢力的割據，另一方面從公元312年羅馬皇帝康斯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後，基督教在各地建教堂，並營造了全面性的教會體制。公元445年羅馬皇帝范倫迪南三世（Valentinian III）且下令各地教會的主教接受羅馬教廷的支配，所以基督教會體制在第五世紀羅馬帝國衰敗後接管了一部分政府的功能。因此整個漫長的中世紀，雖然帝國體系四分五裂，但是社會秩序仍然靠著各地區政治勢力與教會的權威勉強維持著，尤其是羅馬帝國所制定的法令規章多數仍被遵循。這種情形使得中世紀後期，特別是十二世紀市鎮興起後，商賈新興勢力組織的「基爾特」（guild）會社，能夠保障本身的權益，得到各地政治勢力的尊重。大學的初期形成，顯然是當時的學者受到基爾特功能的影響，察覺到「團結就是力量」，有組織才能保障自己的權益。

在文化方面，黑暗時代雖然乏善可陳，不過第六世紀開始由聖本篤修會領先在各地建立的修道院，堅守著文化薪傳的角色。聖本篤修會規強調「祈禱不忘工作」，修士與修女雖然過著與世隔絕的苦修生活，在自立自足的生產工作外，普遍重視學術研究，手抄經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修道院也收藏典籍文獻，使希臘羅馬的人文薪火不致於熄滅。有些修道院也辦有寺院學校以培養傳教士，課程以拉丁文講授。修道院通常設有終身職的院長（abba，英文是abbot，原意為父親），成為監督並經營這種修道院生活社區的大家長（修道院有土地，且僱有佃農，近似一種財產共有的小公社）。修道院裡實施公決制，重要事務須

經過院長主持的院會（council）會商意見（Green & Lewis, 1997: 168-170）。這種生活社區的組織型態對後來大學的發展形式，不無啓示的作用。

羅馬帝國早先在水陸交通上的經營，使得中世紀後期商業熱絡後商人得以游走四方，尤其是羅馬帝國一向以市鎮（通常有城堡）帶動廣大的農村，所以十二世紀以後，超過五萬人口的城市興起，引導經濟貿易的活絡，也使旅遊和結社得到便利。十字軍的數度東征，使原先就不甘困守宮廷生活的騎士，得以走出生活圈，見識各地風土人情，尤其是開始對回教文明有所認識並刮目相看。當時阿拉伯人除了在中亞地區有商業活動外，也到了西班牙及北非地區；阿拉伯的醫學、數學、星象及建築都有相當的水準，知識的實用價值，重燃西歐地區學者對學術研究的熱誠。事實上到了十二世紀，許多世俗化的市鎮學校已在各地應運而生，指導年輕學子研讀聖經及拉丁文文法、演說辯論並教授基本技能（Lerner, Meacham, & Burns, 1998: 336-347）。

大學一詞的拉丁文universitas，原是借用自羅馬法規，意思是「法人組織」（corporation）（Green & Lewis, 1997: 538-539; Palmero, 1958: 111）。田培林教授亦曾指出：「大學的本意只是『學者的集團』或『藝術的集團』，參加大學的人都是已有相當成就的學者，大學中並沒有嚴格的教授或學生的身分」（田培林，1976：538-539）。

根據羅馬司法體制對這種「法人組織」（拉丁文corpora）的認定，必須符合五個條件：（1）至少有創始人三位以上；（2）其行動由多數決定；（3）由一首長或代表人對外處理有關會務；（4）其債務或財產係組織公有，不由個別成員負責；（5）整個法人財產的維持視同一個體，比照任何公民在擁有財產的身分上一樣（Duryea, 2000: 12）。無論是基爾特或法人組織，中世紀歐洲的大學在性質上是一種結社，或

者說是一種學術性的生活社區並以基爾特型態存在，希望受到當地區政治勢力或教會體制的保護；當時的大學尚非一種機構（institution），至少在十二、三世紀發展初期是如此。

二、波羅那大學與巴黎大學的誕生

西洋教育史一般都認為最早的大學是義大利的波羅那（Bologna）與巴黎兩地的學者社區。不過早在十一世紀義大利南部的薩勒諾（Salerno）已經有學者聚集。薩勒諾的地理位置處於基督教、阿拉伯、希臘、猶太四古文明的要衝，所以很早就有學者與年輕人集結在一起研習古希臘與阿拉伯的醫術；雖然沒有醫學院的規模，卻是當時傳承知識的學苑（studium generale）（Perkin, 1997: 7）。

波羅那大學與巴黎大學正式成形於何時？事實上很難以一個年代確認。如同前述，中古時代的大學基本上是一群學人的聚集，這些以追求知識為尚、本身也有學術專長的學者，通常受到若干聲望崇隆的大師級人物所吸引，從四面八方來相會，生活在一起切磋論辯學問。例如經院哲學大師艾別拉（Peter Abelard, 1079-1142）就曾吸引數百學人群集巴黎，據稱其聽眾一度多達五千人（Palmero, 1958: 101），確是盛況少見。巴黎的索爾旁（Sorbonne）在十二世紀末期就因地利人和，聚集了很多學人，並於公元1170年成立基爾特的結社，公元1194年這些學人所在的學苑正式獲得教皇的恩准，享有特別權益的保障（如免納稅、受當地政府保護、免受市民干擾之類）；公元1200年法蘭克國王也頒予保護令。公元1229年巴黎大學曾因若干學者受到謀害而引起師生恐慌，不少人逃往巴黎不遠的市鎮，如奧爾良（Orleans）、韓斯（Reims）及安吉（Angers）；公元1231年教皇要求法王處置謀殺犯，並頒授大學權益章程（Great charter of privileges），才使事件平息（Perkin, 1997: 6）。公

元1245年巴黎大學選出校長（rector），成爲一個學者自治的學術社區；大約在公元1257年法王路易九世的神父索爾旁（Jean de Sorbon）捐贈一棟房舍與土地給這些學者，使這個學術基爾特得免寄人籬下、租居民房，就這樣成爲巴黎大學最早的校舍（十二世紀時捐贈田地、產業予修道院或法人組織已成風氣）。可見巴黎大學的創立以何年爲準，頗難確定。

十二世紀的義大利地區已有不少商業發達的城市，如威尼斯（Venice）、比薩（Pisa）、米蘭（Milan）、斐冷翠（Florence）、拿波里（Naples）及熱諾亞（Genoa）等，由於地利之便，波羅那也聚集了不少好學之士，以研習羅馬帝國的法律及天主教教規爲務。所以當地國王F. Barbarossa於公元1158年頒予這些學人社區以安居章程，教皇也於公元1291年頒授特別權益的保障（Perkin, 1997: 7），一般認爲波羅那大學是世界最早的大學。

巴黎與波羅那兩地學者的基爾特有別於一般商人的基爾特，主要在於他們是一種學術的生活社區（包括已具聲望的學者跟隨若干他們仰慕的大師，也有尙無聲望的年輕人爲了解教會事務或神學相追隨，兩者均以教職人士爲多）。這種社區或自有校舍（如巴黎大學），或租賃民房，皆須託蔭於當地政治勢力的庇護，原則上都要獲得教皇的書面許可（類似今日的認可制），這樣才可以享有一些權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治權。也就是說，生活社區裡的事務由大學自行約束其成員，當地政府或市民不得加以干涉，這正是最原始的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由於這些稱爲大學的生活社區具有法人組織身分，所以有權使用一種共同認證的印章（蓋在封蠟上），以示其法律上的有效性。據文獻所示，十三世紀中期的巴黎大學曾獲教皇賦與主持校務的大師使用印信的權益，以便代表大學對外簽訂協議文書。由此可見，十三世紀的巴黎大學雖然還是

學者與學生的生活社區，然而已漸漸具有機構的性質；而且由學者專注的學術領域來看，也約略可見後來歐洲傳統大學採取的神學、哲學、法學及醫學四個學院架構的跡象。其中巴黎大學在神學方面人才濟濟，大師級人物也不少，跟波羅那大學以法學聞名（研究羅馬帝國法律與教會規律），各有特色。

三、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的起源

巴黎大學到了十三世紀中葉據說一度有七千學生之多，聽課的大部分是來自各地有心治學的年輕人。巴黎大學的模式也被移植到他地，例如法國南部的蒙波利葉（Montpellier）、杜魯斯（Toulouse）、西班牙地區的薩拉曼卡（Salamanca）以及義大利地區的拿波里（Naples）紛紛形成類似的雛形大學社區。其中在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特別意義的是英國地區的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也在十三世紀前期發展成形（Lerner, Meacham & Burns, 1998: 338-342）。

十二世紀後期很多英國學者及有志研究學問的年輕人都越過海峽到歐陸遊學，尤其在巴黎者為數不少。到了公元1193年以後幾年，英王與法王的交惡達到高峰，英王遂採取阻止英格蘭的學子前往歐陸的措施，並號召在法國的英格蘭學子回國。由於兩地關係的惡化，當時英國學者漸轉往牛津（Oxford）這個新市鎮集結。據文獻記載，從公元1190年至1209年牛津一地住過大約七十位學者，包括神學、文藝、法學及醫學都有（Hackett, 1984: 37）。

牛津大學之成為學者與學子講學論道的學術社區應該是十三世紀初，不過要確定證明牛津具有大學身分或法人組織型態，卻遲至公元1231年才有文獻可考。但是在公元1216年已有資料顯示，教皇授權林肯（Lincoln）地區主教任命其轄區的德·露西（Geoffrey de Lucy）為首

任牛津大學住持（Chancellor，當時尚稱不上是校長，應是教會駐校代表）（Hackett, 1984: 21）。

劍橋大學的誕生可說是由牛津大學分割出來，而且也循巴黎大學的模式。公元1209年有一牛津大學的學者以暗箭殺害當地一個婦人，當地政府抓了兩個學者，在國王約翰的許可下，以吊刑將之處決；此事引起牛津學人的恐慌不安，認為他們的安全沒有受到充分的保障，紛紛走離牛津，有一部分學者逃難到劍橋（Cambridge）另起爐灶，成為後來的劍橋大學。劍橋大學跟牛津大學一樣，其學者的基爾特組織一直到公元1250年左右才被認可；但是在公元1231年前後劍橋也受到英王亨利三世頒予保護狀。

牛津及劍橋兩校在設校初期，與當地教會主教的關係相當良好，住持一職以牛津而言，自公元1214年起就由所歸屬的林肯主教區指派；十一年後，劍橋亦由所屬艾理主教（Bishop Ely）來指派。到了十三世紀末期至十四世紀初期，兩校住持逐漸蛻除教會派駐代表的色彩，融入大學的法人組織，正式成為一種學術主管（Duryea, 2000: 23）。到了十五世紀中葉，住持的性質又有了變化，chancellor職務漸成為一種名義上的校長，通常不住在校區裡，而且多非學者，只是由政治界名人出任，他們雖由大學推舉出來，卻無固定任期，實際校務係由副校長（vice-chancellor）主持（Duryea, 2000: 24）。這種英國大學的傳統一直沿襲至今，大學的chancellor職務目前仍然多由政界大老（如卸任部長、首相或王室要員）出任，他們照樣由教授及校友代表經選舉程序產生，校長平日只是主持大典，真正在主管校務的乃是vice-chancellor。早期大英聯邦海外屬地的大學，如新加坡國立大學也還維持此一淵源於十五世紀的傳統。